

乡土社会“结伴养老”：农村老年人互助生活实践与意义构建研究

李 晴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9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9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20日

摘 要

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乡村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本研究聚焦于鲁西南一个村庄内老年人自发形成的“结伴”生活实践。通过质性研究发现，这种以共餐、闲谈与劳作为核心的日常互动，不仅提供了功能性支持，而且是老年人抵御孤独、重建生活节奏与获取价值感的重要方式。研究表明，“结伴养老”实质是老年人在有限条件下主动构建意义世界、展现生命韧性的主体性实践。这一微观视角，为理解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从制度回归生活的观察路径，对构建更具人文关怀的老年支持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农村老年人，结伴养老，主体性，生活世界，乡土社会

“Companionship-Based Elderly Care” in Rural Society: A Study on the Practice and Meaning-Making of Mutual Support among Rural Elderly

Qing L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19,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9,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0,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eakening family-based elderly care functions and rural social trans-

form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elf-initiated “companionship” living practices among the elderly in a village in southwestern Shandong Province. Th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it finds that daily interactions centered on shared meals, casual conversations, and collaborative labor not only provide functional support but also serve as crucial means for the elderly to combat loneliness, reconstruct life rhythms, and regain a sense of valu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ompanionship-based elderly care” is essentially a subjective practice through which the elderly actively construct meaning and demonstrate resilience within limited conditions. This micro-level perspective offers an observation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rural elderly care issues by shifting the focus from “institutions” back to “everyday life”, providing insights for building a more humanistic elderly support system.

Keywords

Rural Elderly, Companionship-Based Elderly Care, Subjectivity, Lifeworld, Rural Socie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农村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的双重压力[1]，老年人的养老生活面临切实挑战[2]。在此背景下，源自社区内部的互助养老实践，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应对途径与本土探索，受到了学界与政策层面的共同关注[3]。

既有研究对农村互助养老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将其视为一种有待完善与推广的“养老模式”，着重分析其制度建构、组织形态与发展路径[4]；二是从治理角度探讨如何实现政府、社区与村民的协同[5]。这些讨论为我们理解互助养老的结构性定位与规范化方向提供了宝贵基础。然而，一个可能被相对忽略的视角是，当研究主要关注互助养老的模式属性时，其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实践的鲜活面目与内在意义容易被遮蔽[6]。换言之，那些发生在老人之间、看似琐碎却日复一日的“结伴”互动，其本身如何被组织与维系，又对参与者意味着什么，仍需回归具体情境进行细致考察。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期望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呈现农村老年人“结伴”生活的真实图景，揭示其在应对晚年生活中的能动性与丰富性。在理论上，这有助于将互助养老的研究，从制度层面部分地引向生活层面，为理解社会变迁中非正式支持系统的内生动力提供一份经验注脚。在实践上，理解并尊重这种源于日常的互助逻辑，或能为构建更具人文关怀、更契合乡土社会实际的老年友好社区，提供来自基层的细微启示。

2. 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2.1. 现有研究述评

既有研究为理解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多维基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对农村养老结构性困境的揭示。大量研究指出，在城镇化与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空巢化趋势加剧，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7]。同时，尽管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8]，但面向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精

神慰藉等普惠性服务依然存在突出短板[9]。这种家庭支持退场与社会服务缺位并存的局面,构成了互助养老兴起的现实土壤[10]。其二,对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模式的多元化探讨。这是当前研究的主流。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制度与治理视角上,探讨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中的实践[11],以及多元主体如何协同建构养老共同体[12]。从类型与机制视角上,系统区分了互助养老的不同类型,并剖析其运行机制与可持续发展路径[13]。从发展路径与困境视角上,历史性地考察其演进过程[14],并理性审视其在推广中面临的发展瓶颈、文化障碍与现实困境[15]。这些研究共同将互助养老建构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的养老模式选项[16]。其三,对技术介入与多元可能性的新近关注。随着技术发展,研究也开始探索智慧养老等技术手段对农村养老的“补位”潜力及其面临的现实制约[17],如子女支付意愿的差异[18]。这反映了在模式探索之外,学界对解决养老难题的多元工具保持开放。

2.2. 研究缺口

上述研究成果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农村互助养老的认知,尤其是其作为一种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养老模式的结构定位与组织形态[19]。然而,一个可能被相对忽略的视角在于,当研究主要仅聚焦于互助养老的模式属性,即仅将其视为一个有待完善、推广或评估的项目、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便更容易将其从具体、鲜活的乡村生活脉络中抽离出来加以审视,更容易导致研究的关注点投向如何更好地组织与管理,而非老年人如何自发地在一起生活[20]。

这种视角可能导致两方面的简化,一是将老年人预设为模式的参与者或受惠者,而非具有丰富情感与能动性的生活者与创造者;二是侧重考察互助养老的功能性输出与组织效率,而可能遮蔽了那些发生在模式框架内外、弥散于老年人日常互动中,对于其自身而言至关重要的社会性与精神性过程。

2.3. 理论视角

为弥补上述研究缺口,将关注点从模式引向生活,本研究主要借鉴以下两种相互关联的理论视角:

一是日常生活社会学视角。该视角主张关注社会成员最普通、最常规的日常活动与互动模式,认为正是这些重复性的实践在默默维系和再生产着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21]。将这一视角引入本研究,意味着我们将不再把“结伴”仅仅视为一种养老策略,而是首先将其视为农村老年人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我们将重点关注那些构成“结伴”生活的微观实践,如共处空间的营造、日常时间的安排、身体间的协作与话语的流动,旨在揭示一种内生性生活秩序是如何在具体互动中被生成与维系的。

二是符号互动论与意义构建视角。该理论强调,人们对自身行动的理解与赋予的意义,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构建和调整的[22]。个体的行为与对自我的认知,深受其与他人互动过程的影响。应用此视角,我们将重点关注老年人在“结伴”互动中如何理解自身的行为、角色及彼此的关系。我们试图探索,通过这种互动,他们如何协商彼此的角色,如何共同应对衰老带来的挑战,如何为晚年的个体生命与群体生活赋予新的意义与价值。

3. 研究方法

3.1. 皇镇村背景介绍

皇镇村位于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共 118 户、478 人。该村呈现典型的北方农业型村庄特征,也是理解当前农村养老处境的一个缩影¹。

该村耕地以小麦、玉米轮作为主,兼种蔬菜,户均耕地约 2.3 亩。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明显,留在村内的多为 60 岁以上老人,村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高达 34.7%。村内家庭结构已基本实现核心化,三代及以

¹数据来源于皇镇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介绍。

上同堂家庭仅占 17%²。受儒家孝文化影响，子女仍普遍承担赡养义务，但在空间分离下，支持更多体现为节日探望与电话问候，村庄内部仍保留较强的熟人社会特质。村内主干道已实现硬化，设有标准化卫生室 1 所，但缺乏专门的老年活动场所。小卖部、村中心广场凉亭及各家院落，自然成为老年人日常聚集的主要空间。这种无专门机构但有自然据点的空间格局，为结伴养老的自发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3.2. 田野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于 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在鲁西南 H 县皇镇村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笔者通过在地观察者的研究角色，近距离观察并接触老人日常，捕捉信息。最终完成对 22 位老年人的深度访谈，其中男性 9 人，女性 13 人，年龄 62 至 86 岁，转录文本约 16 万字。通过对凉亭、小卖部等自然据点的蹲点与入户随访，累计观察 20 天，并辅以 42 份田野备忘录记录研究反思。资料分析严格遵循质性研究的三级编码程序，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甄别本土方言意涵，提取“烟囱”“搭手”“老姊妹”等 226 条初始概念；在主轴编码阶段通过持续比较，归纳出“空间据点化”“时间节奏化”“身体互助”等 12 个主范畴；在选择性编码阶段，提炼出“乡土社会中老年人通过结伴实践主动建构生活世界与主体意义”这一核心范畴，并借助 NVivo 软件管理与回访核实以提升研究效度。

为便于后文论证中对应具体经验材料，本研究对受访者进行匿名化处理并赋予编码(见表 1)。后文引用时将标注受访者编码，如(受访者 A1)。

Table 1. Coding list of interviewees' basic information (N = 22)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编码表(N = 22)

编码	性别	年龄	居住模式	编码	性别	年龄	居住模式
A1	男	72	空巢夫妇	B3	女	67	与配偶同住
A2	男	68	与配偶同住	B4	女	58	与子女同住
A3	男	79	独居	B5	女	75	独居
A4	男	70	与配偶同住	B6	女	63	空巢夫妇
A5	男	62	独居	B7	女	78	独居
A6	男	74	与孙辈同住	B8	女	66	与配偶同住
A7	男	69	空巢夫妇	B9	女	71	与孙辈同住
A8	男	76	与子女同住	B10	女	64	独居
A9	男	82	与子女同住	B11	女	61	与配偶同住
B1	女	65	空巢夫妇	B12	女	77	独居
B2	女	74	独居	B13	女	54	与子女同住

4. “结伴”的生成

4.1. 空间实践

“结伴”首先是空间实践。在皇镇村，小卖部、凉亭与院落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几何坐标，而是在老年人日复一日的身体在场与互动中，被建构为舒茨(Alfred Schutz)所言的“生活世界” [21]。这种转化

²文中数据来自实地调研统计整理所得。

不仅仅是功能的叠加，更是意义与秩序的生成。

最主要的据点是村内小卖部前的开放区域。这里之所以能成为社交中心，不仅因为店主的默许与热水的供应，更因为它充当了手头知识库的激活平台。在闲聊物价、农事与邻里八卦的过程中，老人们不断调取、验证与传递那些关于草药偏方、人情世故的本土经验。这种知识的循环流动，强化了空间的归属感，让老人确认了自身经验在当下的相关性，从而将冰冷的物理角落转化为温暖的意义场域(受访者 A1)。

另一类典型空间是村中心广场的凉亭。借用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戏剧论视角，凉亭是一个典型的“前台区域”。这里的空间使用遵循着严格的“面子”逻辑与约定俗成的秩序，通常长者为先，且群体内部存在对体弱者就坐便利性的无形关照[23]。老人们在此时刻进行着精心的“印象管理”，通过谈论天气、展示精神抖擞的状态，极力维持自己在熟人社会中的体面形象。这种交往更具表演性与开放性，旨在证明自己依然是这个社区中合格的一员。

相比之下，私人宅院则构成了“后台区域”。部分性格开朗、宅院宽敞的老人，其客厅或院落成为了小范围、高稳定性的交往圈所在，尤以老年女性群体为典型(受访者 B1)。这里是卸下面具的私密地带，话题从公共事件转向了更隐秘的病痛诉说与家庭烦恼。空间从私域向公域的过渡，不仅体现了传统乡土社会“家”的边界弹性，更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避难所。

4.2. 时间结构

“结伴”生活遵循着一套与农耕节律、生理周期深度契合的社会时钟，其时间结构呈现出高度的规律性与情境适应性。一日之内，聚集呈现清晰的波峰波谷。午后至傍晚是交往的黄金时段，这与家务劳作间隙、身体倦怠感及光照舒适度相关。许多老人表示午后出门已成为一种不需言明的惯例，这实则是个人生物钟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被逐渐同步的结果，形成了一种基于预期的默契(受访者 B2)。从更长周期看，互助生活的密度与农耕社会的时间节气紧密耦合。农忙时节，公共据点人迹锐减，互助更多融入生产性劳动本身；而在漫长的农闲冬季，据点则成为消磨时日、抱团取暖的核心场所。当群体中有成员经历重病或离世时，余下的老人会通过增加聚集频率、共同追忆等方式，来应对个体生命消逝带来的存在性焦虑(受访者 A3)。这种共同实践，既是对逝者的哀悼仪式，也是对自身生命延续的集体确认，将个体的脆弱性置于共同体的韧性之中。

4.3. 身体互助

互助不止于言辞，更通过身体的具体实践得以落实，这种互助主要表现为“微劳动协作”与“邻近性照看”，共同编织了一张非正式的安全网。“微劳动协作”嵌入日常生活琐事，如穿针引线、代购小物、协同处理农产品等。其特点是任务轻微、情境即时、互惠预期模糊。它不追求等量交换，而是信任善意会在共同体中流转。这种协作在减轻实际负担的同时，更产生出了主体的价值感(受访者 B3)。“邻近性照看”指居住邻近的老人之间，通过日常路径中的顺道一瞥来确认彼此安好。如一位老人每日散步时，会习惯性观察另一位独居老友的烟囱是否冒烟、电视机是否作响。这并非契约性责任，而是基于地理邻近与情感关联所生发出的、近乎本能的关怀实践(受访者 A4)。同时，正如梅洛-庞蒂所强调的，身体是我们栖居于世界的中介[24]。老人们安静地共处一室、各自做活，通过感知他人的身体节奏与气息，老人确认自己并未被世界遗弃，从而在存在论层面获得了安全感。

4.4. 话语互动

老人们的交谈远非无意义的闲谈，而是承担着信息交换、情感支持与集体认同构建的多重功能。表面层面的闲聊涉及天气、物价、社区轶事，实则是维系个体与社区信息网络连接的重要渠道，也是社区

舆论与非正式规范的生成空间。在信任度更高的小圈子里，话语会转向更深的倾诉，内容涉及疾病痛苦、代际矛盾、经济困境、死亡恐惧等生命中的沉重的议题。倾听者通常不提供解决方案，而是通过共情来提供情感确认。这种倾诉不以求取实际帮助为主要目的，而在于将个体苦痛转化为可被分享、承载的集体经验，从而减轻其心理重量。而集体化时期、艰苦劳作、村庄变迁的共同回忆则是被反复言说的话题，个人的记忆碎片被不断讲述、修正、拼接，形成代际的集体记忆。这不仅是怀旧，更是在当下社会角色褪色后重建一代人集体身份与历史价值的重要实践。

4.5. 边界与弹性

“结伴”网络并非均质、无限的，它存在着柔性的边界。生理能力构成最基础的边界。严重失能或认知障碍的老人，事实上被排除在据点式社交之外。行动显著不便者则处于网络的半边缘，依赖他人主动靠近。性别也隐秘地塑造着交往模式，混合性据点多以泛泛社交为主，而更具情感深度与生活琐事分享的强关系，更多存在于同性，尤其是女性之间。个人性情与历史关系是重要的筛选机制。性格极端孤僻或历史上与他人存有芥蒂者，往往处于网络的边缘或外围，而热心、善解人意者则易成为各据点的核心。同时，子女支持有力、经济相对宽裕的老人，在分享与言谈中往往更具底气；而子代支持匮乏、深陷贫困者，则可能因自尊或避免被怜悯而自我设限，减少深度自我披露(受访者 B5)。

5. “结伴”的意义

5.1. 建构安全感

在个体与家庭支持均显薄弱的乡村，衰老常伴随着深刻的孤独与对突发风险的忧虑，而“结伴”则为个体建构了一种踏实感。首先是对社会性孤独的日常抵抗。对许多老人而言，每天走向小卖部或凉亭，并非仅为打发时间，而是一种确认自身仍在场的社会仪式。“去了，就知道自己还在这世上，还有人认得。”一位受访者的话道出了据点最朴素的象征意义(受访者 A3)。其次是构筑应对生活风险的弹性网络。面对身体机能的衰退与正式照护的缺位，互助网络成为了首要的、非正式的安全保障。邻近性的照看正是在微观层面编织了一张应急响应网。这种安全感源于对一种基于地缘与人情的、模糊互惠的共同文化的信任。它虽不能杜绝风险，却极大地缓解了老人面对未知时的无助与焦虑，给予了慰藉。

5.2. 确认价值感

主流叙事常将老人描绘为依赖者，而“结伴”实践则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反转。无论是帮人穿针、代购物品，还是提供一条实用建议，这些微小的互助行为，都是价值生产的瞬间。行动者在宣告“这事我能行”时，也在对抗老而无用的社会污名与自我怀疑。手艺人为大家修理桌椅，不仅是服务，更是其技能与身份在社群中获得延续性认可的方式。在相互倾诉与倾听中，老人不仅是求助者，更成为他人痛苦的承载者与安慰者。能够“听他说说，宽宽他的心”，被视为一种珍贵的能力(受访者 B8)。这种基于共情与经历的相互扶持，使老人确信自己在情感世界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维持了晚年的自尊与心理平衡。借用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观点，老人在互助中重新激活了其“手头知识库”中的如修理、劝慰的技艺与经验。这些在工业化与年轻化社会中曾被边缘化、视为过时的知识，在老年同伴群体中重新获得了相关性 with 有效性。当一位老人成功修好一把椅子或劝解开一对争执的老姐妹时，他不仅在解决具体问题，更是在生活世界内部，对主流社会世界强加的衰老叙事进行纠偏(受访者 A6)。这种价值感的确认，本质上不再是外界的施舍，而是老人在平等互动中自我赋予的主体性。

5.3. 重塑节奏感

脱离社会生产节奏后，老年人的个体时间易陷入空洞与无序。“结伴”实践的重要功能，便是为这

种时间重新赋予一种集体的、可预期的节奏感。午后去凉亭、傍晚到小卖部，这些每日的小约定成为一天中清晰的时间节点，将可能混沌的时光划分出有意义的段落。它创造了基于社会往来的、新的生活韵律，使得时间在期待与完成的循环中变得可把握、可度过。共同的经历填充了抽象的时间。一场投入的闲聊、一次共同的回忆追溯，这些活动以其内在的情感浓度，将流逝的时间转化为具体、可被记忆的故事。在共同应对疾病、丧事等生命事件时，这种集体性的时间体验，更能帮助老人们安置对生命终点的思虑，对抗时间的虚无感。

5.4. 情感的互惠与共同体的想象

在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中，“结伴”实践展现了超越血缘的关系生成的可能。这种关系建立在深度、高频的日常互动与自我披露之上。长期共享时空与生命琐事，催生了超越一般邻里关系的理解与默契。倾诉与共情，满足了个体对深层理解与关怀的情感需求，构成了稳定可靠的支持源。在田野中，老人常以“老姐姐”、“老兄弟”互称，将亲密的同伴关系比附于血缘纽带，在互助中展现出类似家庭内部的利他逻辑，这种横向情感共同体的生成，丰富了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受访者 B13)。

5.5. 互助中的平衡、比较与自主性

任何社会关系都内嵌张力，“结伴”共同体在生成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伴随着需要微妙平衡的现实。其一是付出与回报的模糊期待。互助文化虽强调不图回报，但长期互动中无形的亏欠依然存在。关系的持久性依赖于一种心照不宣的、对大体平衡的感知，长期的单方面付出或接受可能滋生隐忍的不满。其二是无所不在的社会比较。在分享子女状况、经济境遇时，共同体也可能成为一个隐形的比较场域，不经意间强化既有的社会分层，使境况较差者感到压力，从而可能选择自我疏离。其三是依赖与自主的永恒纠结。深度互助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依赖。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皇镇村的田野调查，呈现了农村老年人“结伴养老”这一生动、自发的互助实践图景。研究发现，这种实践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是老年人面对家庭与正式支持双重不足时，主动构建的一种兼具功能性与意义性的晚年生活方式。它不仅通过空间聚合、时间同步、身体协作与话语互动解决了部分实际照看与陪伴需求，更在深层次上，为参与者构建了对抗孤独的安全感、确认自我价值的成就感、重塑生活秩序的控制感以及超越血缘的情感归属感。

基于对上述本土实践的理解，我们尝试提出其可能蕴含的实践启示。政策制定与社会支持的首要前提，应在于尊重、识别与善用这种内生于社区的社会性力量。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乡村规划与公共资源投放中，有意识地维护而非清除那些自然形成的、非正式的社交据点，改善其基础条件，为其日常互动提供便利。二是将正式服务体系，如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定位为支持者而非替代者，其功能在于为那些因身心原因无法融入互助网络的边缘老人提供兜底服务，从而减轻核心互助群体的压力。三是认识到最深厚的互助文化源于共同生活的情感与信任，外力难以创造，最佳角色是创造宽松、包容的环境。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本研究揭示的“结伴养老”逻辑，根植于皇镇村这一特定类型的北方农业型村庄。在将其推及其他语境时，需谨慎界定其适用边界。首先是村庄类型与资源条件的调节效应。在宗族型村庄，基于血缘的家族网络可能强于地缘结伴，互助更可能嵌入亲属义务之中，而非完全基于自愿选择。在城郊富裕村，若集体经济发达、市场化养老服务充足，老人对低成本的邻里互助依赖可能降低，“结伴”更多表现为休闲社交而非生存策略。在极端空心化的山区村，若留守老人普遍高龄、失能，则“结伴”网络可能因缺乏健康行动者而难以维系，此时更需外部正式力量的介入。其次是文化观念与代际关系的异质性。在个体主义观念较强、邻里关系淡漠的地区，老人可能更倾向于封

闭式的家庭养老或市场化养老,对“结伴”的需求与信任度较低。而在孝道观念浓厚但子女确无力照料的地区,结伴养老则可能作为一种补充被广泛接受。

因此,必须承认,本研究作为一项基于单一村落的质性探索,其发现重在揭示机制与意义,而无法代表广大农村地区的全貌。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个案的特殊性使其结论的普遍性有待验证;横截面研究难以充分展现“结伴”群体随成员老化、更替而发生的动态变迁。未来研究可在不同区域开展多点比较,考察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如何形塑互助模式;亦可对典型群体进行长期追踪,关注互助网络的韧性、代际传递与技术媒介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韦艳,曾卓玉.从照料缺位到技术补位:农村智慧养老服务子女支付意愿的性别差异研究[J/OL].兰州学刊: 1-22. <https://link.cnki.net/urlid/62.1015.c.20260508.1440.008>, 2026-05-18.
- [2] 陈欣欣,陈燕凤,龚金泉,等.我国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和养老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4): 64-77.
- [3] 贺雪峰.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5): 1-8.
- [4] 刘妮娜.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类型与运行机制探析[J].人口研究, 2019, 43(2): 100-112.
- [5] 杜鹏,安瑞霞.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下的中国农村互助养老[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6(3): 50-57.
- [6] 钟仁耀,王建云,张继元.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 22-31.
- [7] 石智雷.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J].社会学研究, 2015, 30(5): 189-215+246.
- [8] 张晔,程令国,刘志彪.“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养老质量的影响研究[J].经济学(季刊), 2016, 15(2): 817-844.
- [9] 姚虹,向运华.健康状况、空巢原因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以恩施市农村空巢老人为例[J].社会保障研究, 2018(1): 13-19.
- [10] 甘颖.农村互助养老共同体的多元建构模式及其实践[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43(3): 74-82.
- [11] 刘妮娜.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1): 121-131.
- [12] 李俏,刘亚琪.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与发展走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5): 72-78.
- [13] 金华宝.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发展瓶颈与完善路径[J].探索, 2014(6): 155-161.
- [14] 赵志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0(1): 72-75.
- [15] 马光荣,周广肃.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J].经济研究, 2014, 49(11): 116-129.
- [16] 陈芳,方长春.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出路: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J].人口与发展, 2014, 20(1): 99-106.
- [17] 李洪心,李巍.国内外养老模式研究[J].经济与管理, 2012, 26(12): 18-22.
- [18] 刘妮娜.互助与合作: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模式研究[J].人口研究, 2017, 41(4): 72-81.
- [19] 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经济研究, 2014, 49(11): 102-115.
- [20] 林宝.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影响与应对[J].西部论坛, 2015, 25(2): 73-81.
- [21] 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M].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 [22] 赫伯特·布鲁默.符号互动论:视角与方法[M].林邦雄,林庭瑶,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
- [23]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4]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